
钱谦益排击“竟陵钟、谭”与 《列朝诗集》编纂旨意

On Qian Qianyi's Repulsion and Attack on Zhong Xing and Tan Yuanchun from the Jingling School and His Compilation of "Anthology of the Ming Dynasty Poetry"

张 爽

Zhang Shuang

内容提要：

“竟陵”诗风风行明末三十多年，钱谦益排击最力，几成定谳。钱氏对其的批评，集中于氏著《列朝诗集小传》。由此书及氏著其他的诗文中细拣出关于“竟陵”诗风的内容，对钱氏有关“竟陵”诗风的批判模式和思考方向加以分析，可以看出钱氏对“竟陵”诗风的批判，从文学范畴，扩展到政治、道德范畴，且相互交叠。究其排击“竟陵”与编纂《列朝诗集》的旨意之一，就是通过刻意淡化“竟陵”诗风在明末诗坛已经发生或者继续发生的影响，借此掌一代诗坛之“坛坫”，并用编纂《列朝诗集》之方式，试图构建以自己诗学观念为主的明清诗坛，并垂范后世，青史留名。

关键词：

列朝诗集 钱谦益 钟惺 诗妖

ABSTRACT

The "Jingling poetry school" dominated poetry for over thirty year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1368-1644). Qian Qianyi (1582-1664) repelled and attacked it most. Qian concentrated his criticism in his *Biographies Attached to Anthology of the Ming Dynasty Poetry*. From the content concerning the "Jingling poetry school" style from Qian's *Biographies* and other poetry collections he compiled, and the analysis on his pattern of criticism and way of thoughts, we find that Qian Qianyi's criticism of the poetry style ranges from literature to politics and morality, all three aspects overlapping one another. One purpose in attacking the "Jingling poetry school" and in compiling *Anthology of the Ming Dynasty Poetry* was to take over the leadership of literature by deliberately weakening the influence which had been and would possibly be exerted by the "Jingling poetry style" over the late Ming dynasty poetry world. The article also argues that through compiling *Anthology of the Ming Dynasty Poetry* Qian tried to establish dominance of his own theory so as to leave his name to posterity.

KEY WORDS

Anthology of the Ming Dynasty Poetry, Qian Qianyi (1582-1664), Zhong Xing (1574-1624), poetry as evil women

明代中叶，“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运动达到高潮，却又逐渐流于“模拟剽贼”。万历中期以后，“公安三袁”主张“独抒性灵”，痛击复古的弊端。接着，“竟陵钟、谭”继起，从另外的角度也抨击了复古一派。至明清鼎革，钱谦益力起排击“竟陵”诗风“深幽孤峭”，几成定谳。钱氏对其的批评，集中于氏著《列朝诗集小传》。目前对于《列朝诗集小传》的研究主要单从编纂旨意着手¹，甚少关联至虞山、竟陵代兴这一重大事件。而究其编纂《列朝诗集》与排击“竟陵”的旨意之一，就是通过刻意淡化“竟陵”诗风在明末诗坛已经发生或者继续发生的影响，以此掌一代诗坛之“坛坫”，并用编纂《列朝诗集》之方式，构建自己诗学观念为主的明清诗坛，垂范后世，青史留名。

一 钱谦益其人

钱谦益（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牧斋老人、蒙叟、东涧老人等，人称虞山先生，江苏常熟人，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

钱谦益仕于晚明朝廷，清军入关后投降，随例北迁，任职于清廷。虽然仅半载即辞官南归，可他的这段“贰臣”经历却被后人所诟病。不过这并不影响钱氏在明清之际文坛中的地位，黄宗羲说其“主文章之坛坫者五十年”²，此言不虚。连生平立场最坚定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引用了钱谦益批判钟惺的一条：“句读之不析，文理之不通，俨然丹黄甲乙，衡加于经传，是之谓非圣者无法，是之谓辱圣人之言。而世方奉为金科玉条，递相师述，学术日颇，而人心日坏，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顾炎武随后更严厉写道：“当时之学臣，其于伯敬（按：钟惺）固当如茶肆之陆鸿渐，奉为利市之神，又何怪读其所选之诗，以为《风》、《骚》再作者耶？其罪虽不及李贽，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³可见，在评论钟惺的态度方面，顾炎武是很赞同钱谦益的。

就是这样一个名列《贰臣传》的大学者，其政治立场固然为人所议论，但学术成就确实是无可争议的。特别是其诗学理论的构建，奋力排击晚明前后“七子”复古思潮，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运动，并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以“有本”为基础，将“灵心”、“世运”及“学问”三者相结合的诗学理论体系，成为一代掌文章权柄之人。

在钱氏诗学理论的建立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竟陵”诗风的批判。大力批评“竟陵”诗风的“幽深孤峭”，认为钟、谭二人所编选之《古今诗归》“寡陋无稽，错缪叠出”。而后，如前述顾炎武，后来的朱彝尊等人也都接受并且延续了他的观点，进而对“竟陵”诗风大力鞭笞，影响之大，甚至延续到了三百年后的今天。通过以上钱氏关于“竟陵”诗风的文字，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钱氏对“竟陵”诗风是相当排斥的。但是，关于晚明时期诗坛中的“竟陵”诗风的盛行程度，钱氏本人亦不能否认，其在《列朝诗集小传·钟提学惺》（后文简称《小传》）中就写道，钟、谭名闻之后，“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浸淫三十余年”⁴。

1 参见李先耕：《钱谦益论钟惺发微》，《文艺研究》，2006年第12期；严迪昌：《蒙叟心志与〈列朝诗集〉之编纂旨意》，《语文知识》，2007年第4期；周建渝：《〈列朝诗集小传〉的明诗批评及其用意》，《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严志雄：《钱谦益攻排竟陵钟、谭侧议》，《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4卷第2期；简锦松：《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之批评立场》，《文字新钥》，2004年第2期。

2 《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37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3 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第1035、1036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

4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570、5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于是，这就出现一个问题：“竟陵”诗风于晚明的出现并且盛行一时，必然有着它值得发扬传承的优点。而钱氏却为何如此抨击，甚至从文学范畴的批评上升到政治范畴，说其诗风是“征兆国家之盛衰”，是“诗妖”。

二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对“竟陵钟、谭”的排击

关于钱氏排击“竟陵”的文字，最集中即是《小传》中《钟提学惺》以及其所附的《谭解元元春》两文，其中钟惺的传文：

惺，字伯敬，竟陵人。万历庚戌进士，授行人，迁南京礼部祠祭主事，历仪制郎中，以佾事提学福建，丁忧归，卒于家。伯敬少负才藻，有声公车间。擢第之后，思别出手眼，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以驱驾古人之上。而同里有谭生元春，为之应和，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钟谭体。譬之春秋之世，天下无王，桓文不作，宋襄徐偃德凉力薄，起而执会盟之柄，天下莫敢以为非霸也。数年之后，所撰《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而寡陋无稽，错缪叠出，稍知古学者咸能挟策以攻其短。《诗归》出，而钟谭之底蕴毕露，沟浍之盈于是乎涸然无余地矣。当其创获之初，亦尝覃思苦心，寻味古人之微言奥旨，少有一知半见，掠影希光，以求绝出于时俗。久之，见日益僻，胆日益粗，举古人之高文大篇铺陈排比者，以为繁芜熟烂，胥欲扫而刊之，而惟其僻见之是师，其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浸淫三十余年，风移俗易，滔滔不返¹。

在此段文字中，钱氏开篇即对钟惺的仕途作了初步介绍：“万历庚戌进士，授行人，迁南京礼部祠祭主事，历仪制郎中，以佾事提学福建”，紧接着就是“丁忧归，卒于家”的部分。言下之意，钟氏一生值得记载的仅为仕进之路。但是，钟氏的才学始终是不能忽略的。于是，钱氏于后文中又补充了“伯敬少负才藻”一句，本以为此句后会有关于钟氏求学之路以及才学的具体描述。可钱氏笔锋一转，行文又回到“有声公车间”，一笔带过对钟氏才学的描写，想表达的是：钟氏“有声公车间”是其“少负才学”的主要原因，于此，由文学范畴直接联系到政治范畴²。而这一句“少负才学”也成为全文中仅有的一点关于钟氏才学的描写，其用意在于，刻意淡化钟氏的才学成就。后面的叙述，延续了上文思路，仍从钟氏仕途起笔，“擢第之后，思别出手眼，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以驱驾古人之上。”此句的含义与“伯敬少负才藻，有声公车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的表达给人的印象便是：钟氏是在“擢第”后，也就是在仕途上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之后，才着手于其诗学理论的构建，而这仕宦身份才是他引导诗学风气三十年的基础，于是，钱氏便第二次将文学范畴与政治范畴相连。紧接下一句，“而同里有谭生元春，为之应和，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钟谭体。”谭元春身为钟氏的同里，和钟氏有着地域上的密切联系，但这里的“应和”并未点明是否出自于谭氏对钟氏的推重，只

¹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570、571页。

² 严志雄：《钱谦益攻排竟陵钟、谭侧议》，《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4卷第2期。

是由于是“同里”之人，所以“应和”。而后“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一句，虽非钱氏赞钟、谭之意，但是却能推想出“竟陵”诗风受时人推崇之盛况，这正是钱氏虽刻意淡化却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虽然承认海内“靡然从之”的地位，却又似乎是“欲抑先扬”，原来这“靡然从之”，正如春秋时期，天下无主，“桓文不作”，因而只有“德凉力薄”的宋襄、徐偃起而“执会盟之柄”。以春秋争霸比喻晚明的诗坛是“无主”的时代，有才之人不作为，这才让“德凉力薄”之人——即钟、谭二人——轻松获得诗坛盟主的地位，甚至是那些“靡然从之”的人，也仅仅是“莫敢以为非霸也”。于此，钱氏一笔抹杀了钟、谭二人于晚明诗坛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否认了他们所创立的“竟陵”一脉廓清了前后“七子”的复古浪潮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模仿弊端，开启了耳目一新的诗风。这其中关键的“德凉力薄”的评价，不仅有着对于钟、谭二人才华、诗学的否定，更有着对于其个人道德的否定，“德薄”二字，一言以概之，将文学范畴与道德范畴相联系且重叠不分。而此之后的文字中，主语也不仅是钟惺，而是“钟、谭”二人了。

下面的文字，直接略过钟、谭二人的学术活动，由“擢第之后”直接写到“数年之后，所撰《古今诗归》盛行于世”，再一次将文学范畴与政治范畴相连。暗示是在取得仕宦身份数年后，才成《诗归》一书，其仕宦之身份是成就《诗归》的重要条件。但不可否认的是《诗归》对当时学人士子的影响，这一点亦可从文字中体会出：“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删定。”后文，钱氏直言《诗归》一书：“寡陋无稽，错缪叠出，稍知古学者咸能挟策以攻其短。”因而，钟、谭二人的“底蕴毕露，沟浚之盈于是乎涸然无余地矣。”可是，其中也有矛盾之处：如此“寡陋无稽”的《诗归》为何在晚明风行甚久，而且达到“承学之士，家置一编”的地步。钱氏排击这部盛行的著作以及其引领的诗风，其中深意，我们将在下文予以论述。接下来，钱氏直接进入对钟、谭二人才华、诗学的批评。仍旧“先扬”，认为在其“创获之初”，还是“覃思苦心，寻味古人之微言奥旨”的，并且“少有一知半见，掠影希光，以求绝出于时俗”，而后态度一转，称其是“见日益僻，胆日益粗”。在钱氏的笔下，钟、谭二人是以缺乏毅力与恒心的形象出现的，虽然于初期也有静心治学的想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仕宦功名的获得，更是随着其在诗坛上领导地位的确立而消失。

之后的几句，不仅针对“竟陵钟、谭”本人之才华、诗学，更是钱氏批判“竟陵”诗风否定的典型用语：“举古人之高文大篇铺陈排比者，以为繁芜熟烂，胥欲扫而刊之，而惟其僻见之是师，其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浸淫三十余年，风移俗易，滔滔不返。”这“深幽孤峭”、“木客之清吟”、“幽独君之冥语”，以及后文中出现的“鬼趣”、“兵象”¹，是在钱氏有关“竟陵”的文字中反复出现的，且再没有出这意思之外的词语，来批判“竟陵”诗风。换句话说，钱氏对于“竟陵”诗风的批评，除以上文字之外，没有更细致、更明确、更令人信服的表达。纵览钱氏诗文集，不仅不能获得对于竟陵“寡陋”之处的清晰认识，而给人的感觉却是：只要是“竟陵”一脉之人（钟、谭二人以及追随者），或者是与“竟陵”持相同诗论的人，都可以用这类词语来描述。更甚至于，在钱氏看来，是否与“竟陵”同调，成为臧否人物

1 在钱氏论“竟陵钟、谭”的文字中，反复出现“木客”、“幽独君”一类的词语。“木客”即为山中怪物。《太平寰宇记》引牛肃《纪闻》：古代汀州“州境五百里，山深，林木秀茂……地多瘴疠，山都、木客，丛萃其中。”“山都所居，其高者曰人都，在其中者曰猪都，处其下者曰鸟都。”（乐史：《太平寰宇记》，第2034、2035页，中华书局，2007年。）“幽独君”即指鬼怪。《全唐文》卷四百五十八载李道昌《祭幽独君文》。（董诰：《全唐文》，第4678页，中华书局，1983年。）“鬼趣”、“兵象”一语，钱氏于《初学集·徐司寇画溪诗集序》中有解释：“尝取近代之诗而观之，以清深奥僻为致者，如鸣蚓窍，如入鼠穴，凄声寒魄，此鬼趣也。以尖新割剥为能者，如戴假面，如作胡语，噍音促节，此兵象也。”（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第9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以及《列朝诗集》选评诗作乃至卷次排列的关键。

紧接着，钱氏显然意犹未尽：

余尝论近代之诗，抉摛洗削，以凄声寒魄为致，此鬼趣也。尖新割剥，以噍音促节为能，此兵象也。鬼气幽，兵气杀，著见于文章，而国运从之，以一二轻才寡学之士，衡操斯文之柄，而征兆国家之盛衰，可胜叹悼哉！钟之才，固优于谭。江行俳体，其赴公车之作，入蜀诸诗，其初第之作，习气未深，声调犹在，余得采而录之。唐天宝之乐章，曲终繁声，名为入破；钟谭之类，岂亦五行志所谓诗妖者乎！余岂忍以蚓窍之音，为关雎之乱哉¹！

由“鬼趣”、“兵象”的这样的模糊概念，作为批判“竟陵”诗风的“典型用语”，而后直接联系至“国运”盛衰，甚至于“诗妖”²。于此，钱氏完全将文学范畴扩展至政治范畴的巅峰，从政治角度对“竟陵”一脉进行谴责，没有明确的文字分析钟、谭诗作为何“寡陋”，更没有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这诗作、诗风与国家的兴亡到底有着何种联系，只是断然连接二者于此，用比较“暴力”的手段为钟、谭诗作下了“诗妖”的定讞，以至于三百年之后的今天，“竟陵”诗风仍旧处于“征兆国家之盛衰”的历史和道德的双重压力之下，难以翻身；而历史似乎也帮了钱氏的大忙，“竟陵”诗风盛行之时，正是明朝内外交困终至灭亡之时。明朝灭亡后，“竟陵”诗风被后学之人不断批判。而以诗预言国家的兴衰，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一大特色，更是触及“中国人思想、信仰系统里某些相当深层、敏感的元素”³。而在此段文字中，也显露更多关于钱氏排击“竟陵”诗风的旨意：其言“以一二轻才寡学之士，衡操斯文之柄”，这当然是他作为“馆阁”大佬所不能容忍的⁴；而《列朝诗集》中选入的钟氏诗作，是采其“习气未深，声调犹在”之时的作品，这当然也是依据钱氏本人之意愿来删减裁定的。这其中也透露出，钱氏所编选《列朝诗集》的旨意之一，即是按照自己的观念，建立起对某些同调者的肯定以及对相异者的否定的诗学体系，构建一个由自己的诗学观念为主导的明朝诗坛，由己掌握一代诗坛之“权柄”，以期流传后世。文段末尾，总结全文，点明整篇文章的主旨：“余岂忍以蚓窍之音，为关雎之乱哉！”一个欲掌天下之文柄而垂范后世的形象，昭然若揭。

至于谭元春的小传，不是独立成条，仅附于钟氏小传之后，钱氏这样写道：

元春，字友夏，竟陵人。举于乡，为第一人。再上公车，歿于旅店。与钟伯敬共定《诗归》，世所称钟、谭者也。钟谭之疵病，如上所陈，亦已略见一斑。谭之才力薄于钟，其学殖尤浅，谩劣弥甚，以俚率为清真，以僻涉为幽峭，作似了不了之语，以为意表之言，不知求深而弥浅；写可解

1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571页。

2 “诗妖”一词，《汉书·五行志》引用了西汉刘向《洪范五行传论》中的一段话：“言之不从，是谓不艾，厥咎僭，厥罚恒阳，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豕。时则有口舌之病，时则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且于后文解释道：“君炕阳而暴虐，臣畏刑而柑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班固：《汉书》，第1376、1377页，中华书局，1962年。）也就是说，指的是某些为祸乱征兆的里巷歌谣，这似与钱氏所表达的“诗妖”一词的含义有所出入。

3 严志雄：《钱谦益攻排竟陵钟、谭侧议》。

4 关于钱氏攻排钟、谭二人所涉及的“台阁”与“外署”之争，参见简锦松：《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之批评立场》。

不解之景，以为物外之象，不知求新而转陈。无字不哑，无句不谜，无一篇不破碎断落。一言之内，意义违反，如隔燕吴；数行之中，词旨蒙晦，莫辨阡陌。原其初，岂无一知半解、游光略影，居然谓文外独绝，妙处不传，不自知其识之堕于魔，而趣之沈于鬼也。已而名日盛，游日广，识下而心粗，胆张而笔放，遂欲秤量古今，牢笼宇宙。《诗归》之作，金根缪解，鲁鱼讹传，兔园老学究皆能指其疵陋，而举世传习奉为金科玉条，不亦悲乎¹。

关于谭元春的生平的描写，与钟惺传文的行文方式如出一辙。仅言其仕宦之途，且对其才学的批判更甚于钟惺：“谭之才力薄于钟，其学殖尤浅”。紧接着，在“名日盛”的诗坛领导地位确立后，便“识下而心粗，胆张而笔放”。最后以《诗归》作结，指其是“金根缪解，鲁鱼讹传，兔园老学究皆能指其疵陋”。

接着，后文提及了“性灵”：

世之论者曰：“钟、谭一出，海内始知性灵二字。”然则钟、谭未出，海内之文人才士皆石人木偶乎！曰极七子之才致，不过为宋之陆放翁，自南渡以迄隆、万，将五百年，亦皆石人木偶，而性灵独培发于钟、谭乎²！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时人认为“竟陵”的成就是首倡“性灵”一说。但钱氏认为，首提“性灵”的另有其人，他在《小传·袁稽勋宏道》一文中写道：“万历中年，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文长、义仍，崭然有异，沉痾滋蔓，未克芟薙。”接着下文中，总结了袁氏之诗学主张，言袁氏认为：“唐人千岁而新，今人脱手而旧，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剽拟者所从来异乎！”因而，“中郎（按：袁宏道）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浚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³从这一评价可以看出，钱氏是对袁氏的“性灵”说评价是很高的。另外，在钱氏其他诗文中，还能看到钱氏赞同此观点的字句，如《小传·杨仪部循吉》中，杨氏所讲“不以格律体裁为论，惟求直吐胸怀、实叙景象，妇人小子皆晓所谓者，然后定为好诗。其他佶钉攒簇，拘拘拾古人涕唾者，亦木偶之假线索以举动者，吾无取焉”，钱氏在其后评价说：“近代崇奉俗学，以剽贼模拟为能事，君（按：杨循吉）谦斯言，真对病之药也”⁴。在《小传·石田先生沈周》中，钱氏说与程嘉燧曾赞其诗“才情风发，天真烂漫，舒写性情”。从以上文字中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钱氏对于“性灵”说评价颇高。

钱钟书先生在其《谈艺录》中认为：“钟谭论诗皆主‘灵’字”，与严羽的主张是“貌异心同”⁵。有关于严羽之主张，在钱氏《牧斋有学集·唐诗英华序》（后文简称《有学集》）中有非常严厉的批评，他言：“严氏以禅喻诗，无知妄论……其似是而非，误入箴芒者，莫甚于妙悟之一言。……严氏之论诗，亦其翳热之病耳。

1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172页。

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572页。

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567页。

4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281页。

5 钱钟书：《谈艺录》（补订重排本），第310页，三联书店，2001年。

而其症传染于后世，举目皆严氏之管也，发言皆严氏之谥也，而互相标表，期以药天下之诗病，岂不俱哉！”¹ 钱钟书先生则认为，这一说与钟、谭主“灵”字其实是“貌异心同”。推之，对于钟、谭主“灵”说，钱氏也应该持相同的大力排击的态度。但在钱氏排击钟、谭的文字中，人们可以看到的仅仅是：认为提出的“性灵”一说应该归功于袁宏道与其背后的“公安”一脉²，并于袁宏道的小传中大加赞赏其发轫之功，而不同意当世人皆认为的“性灵”出于钟、谭二人的观点。而且从上面的文字中可知，关于“直吐胸怀”、“舒写性情”一类的“性灵”诗论，钱氏也是持相当肯定的态度。而钱氏自身的诗学理论中，也有主“灵心”说。这主“灵心”与“性灵”实有太多相似之处，甚至与严羽之“妙悟”说，王士禛“神韵”说，在某些方面都相似相通。回到之前，钱氏在诗文中，大力抨击严羽的“妙悟”说，却对袁宏道之“性灵”说以及“竟陵”主“灵”未加苛责，从此可以略见钱氏的某些诗学倾向。总之，钱氏所在意的，是由谁提出主“灵”之说，由谁来掌握话语权，而这诗风的本身内容，还是钱氏其次的考虑。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本文对《列朝诗集》编纂旨意的推论。

回到谭元春的传文。接着，钱氏总结了“竟陵”诗风“寡陋”的原因：“以一言蔽其病曰：不学而已。亦以一言蔽从之者之病曰：便于不说学而已。”“竟陵”诗风“不学”的弊病完全是与钱氏的诗学立场背道而驰的，他所提倡的“茁长于学问”³，是其诗学理论中相当重要的一环。

再接着，钱氏又有了一次文学范畴与政治范畴的联系，虽并未明言“诗妖”一词，但是这“洪范五行者”其实是完全可以等同，他言：

天丧斯文，余分闰位，竟陵之诗与西国之教、三峰之禅，旁午发作，并为孽于斯世，后有传洪范五行者，固将大书特书著其事应，岂过论哉！⁴

之后，钱氏特别点明其与钟氏“同年”的身份，与谭氏“相好”的身份，且言吴中子弟“訾訾”钟、谭二人，他却“深为护惜”，而且还“虚心评鹭，往复良久，不得已而昌言击排”。钱氏刻意营造出一个与钟、谭二人交好的友人形象，一个忧心明清之际文化风气的导师形象。

然后，钱氏又引程嘉燧之话，将自己保持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吾友程孟阳（程嘉燧）之言曰：“诗之学，自何、李而变，务于模拟声调，所谓以矜气作之者也；自钟、谭而晦，竞于僻涩蒙昧，所谓以昏气出之者也。”孟阳老于诗学，其言最为平允，论近代之诗者，衷之于孟阳斯可矣⁵。

1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第707、7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2 钱氏虽对“公安三袁”略有微词，但是整体上是相当回护的，如在《小传·袁稽勋宏道》中引用了袁中道对袁宏道文集的评语，但态度与语意尚温和。推测有两个原因：一是钱氏本身与“公安三袁”私交甚好，特别是与袁中道，在钱氏诗作《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之六中盛赞袁氏“楚国三袁季绝尘”；二是“竟陵钟、谭”是借纠正“公安三袁”诗风起而主坛站的，钱氏借推重“公安三袁”，提高其地位，达到刻意淡化“竟陵”诗风的影响的目的。

3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第1594页。

4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572页。

5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273～572页。

这“平允”之人所暗示的,当然是钱氏自己。传文于此,本应结束,钱氏似乎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另起一段。而这一几乎和传文字数相当的文字最特别之处在于——单以谭元春作为批判的主语,且措辞极为严厉¹,言:

友夏诗,贫也,非寒也,薄也,非瘦也;僻也,非幽也;凡也,非近也;昧也,非深也;断也,非掉也;乱也,非变也。芜词累句,略举一二:如《拟读曲歌》云:“庞是侬家庞,日噉侬家粥。昔昔不吠欢,侬私令噉肉。”《夏夜古意》云:“明月皎皎照罗帏,罗花一一影香肌。郎来谗妾肌生花,取衣覆肌花在衣。”何其淫哇卑贱也!《隋大业镬歌》云:“镬兮镬兮!不复镬兮!以之薰香,大损沉水。”何其俚也。《听青羊磬》云:“太始有真意,钦哉非雨声。”用经义何其谬也。“岁添新事送,月放众生肥。”“三吴士女俗,万古雨晴天。”“眼花非乱射,散作万山江。”“万叶一色红易终,我爱黄边绿边江。”何其鄙而倍也²!

这是钱氏批判谭元春诗作“寡陋”最详细的文字。一个排比句式在“贫”、“薄”、“僻”、“凡”、“昧”、“断”、“乱”七个褒贬界限模糊的词语之后,钱氏又从文学范畴扩展到道德范畴:言谭氏之诗,“何其淫哇卑贱也”,“何其俚也”,“用经义何其谬也”,“何其鄙而倍也”,从道德的高度对谭氏诗作了极其负面的评价。

接着下文举出闽人蔡复“尽弃所学”拜于谭元春门下而极易成诗的例子,加强了对谭氏的批判,且言:“录诗及此,庸以别裁末流,垂戒后学,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世之君子,亦可以谅我矣!”一位欲主导诗坛风尚而垂范后世的形象再度出现。再后之引用“金陵张文寺”的批判,主语又回到钟、谭二人,“才情不奇”、“学问不厚”、“性灵不贵”、“风雅不遒”的“不读书”的弊病,内容类似于前引程嘉燧的话,用意也类似于前,这里不再赘述。而谭氏传文最末一个例子令人觉得格外意味深长:

吴门朱隗曰:“伯敬诗‘桃花少人事’,诋之者曰:‘李花独当终日忙乎?’友夏诗‘秋声半夜真’,则甲夜、乙夜,秋声尚假乎?”云子本推服钟、谭,而其言如此³。

借钟、谭追随者的朱隗的话,却说的是批判二人诗作的事,借此暗示钟、谭的诗作甚至不为追随者所推重。例子完结,未做评价文章即结束,留待读者各来评判。

以上是钱氏诗文中最集中的关于“竟陵钟、谭”的文字。至此,对“竟陵”诗风的批判模式和思考方向完全成型:用一些意思模糊的词语对“竟陵”诗风作出评价,或言“深幽孤峭”,或言“木客之清吟”、“幽独君之冥语”,或言“鬼趣”、“兵象”,却并没有更细致、更明确、更令人信服的表达;同时,行文中将对钟惺、谭元春本人诗作、“竟陵”后学之人诗作以及“竟陵”学风的批判相互混淆,甚至对与“竟陵”一脉持相同观

1 陈寅恪认为:“晋伯敬之辞,略宽于友夏,殆由钱钟两人有会试齐年之谊。”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9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此存作为一家之言。

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573页。

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574页。

点的人都用此类的文字，或刻意淡化其人成就，或严厉斥责，或二者兼有之¹；再者，批判前后充满着不一致性，偶尔会有着正面的评价，如“竟陵代起，以凄清幽独矫之，而海内之风气复大变。”²如在上述严羽、钟、谭问题上的模棱两可态度，都使人对“竟陵”一脉的诗学理论及其诗风没有相当确定和清晰的印象，反而是从那些并非出自钱氏本意的文字中窥见了些许“竟陵”诗风在当时所取得的、却被钱氏刻意剥削的成就。

由此看来，钱氏对“竟陵”诗风并非如文字表面所传达的那般排斥，其所在意的，是由谁来掌握诗坛的风向趋势。而且，钱氏对于钟、谭二人的批判重点，不在于诗作本身的“寡陋”，而是将其从文学范畴，扩展到政治范畴、道德范畴，甚至于几个范畴之间相互联系混乱交叠。

《小传》中除了以上集中的关于钟、谭二人的文字外，另有一些散见于全书中，细拣一些如下：

第一，《小传·沈秀才春泽》：钱氏笔下的沈氏是一个“才情故自烂然，率易丛杂，成章者绝少”的人，其对钟惺是“深所慕好”的，且又是钟氏《隐秀轩集》的刊刻者。他同上文的“吴门朱隗”一样，是作为“竟陵”诗风的追随者的形象出现的，当然用意也一样。因为沈氏在钟氏去世后，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大江以南，学伯敬者，以寂寥言简练，以寡薄言清迥，以浅俚言冲淡，以生涩言尖新。篇章句字，多下一二助语，辄自命曰空灵；余以为空则有之，灵则未也。波流风靡，彼倡此和，未必非钟、谭为戎首也³。

这里所批判的，并非钟氏本人的诗作，而是“竟陵”后学的诗作，这与《谭解元元春》中“吴门朱隗”直接批判“钟、谭二人”诗作，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后者是更为直接，虽然沈氏也提出这诗风的始作俑者仍然要归之于钟惺和谭元春。从沈氏的话中，可以了解些许时人对钟惺诗风的称赞，“简练”、“清迥”、“冲淡”、“尖新”、“空灵”。而这些词语，也正是钱氏批判“竟陵”诗风所常用的。由此确定，钱氏批判“竟陵”诗风是不明确与不清晰的，且完全不理睬时人对于“竟陵”诗风之称赞，只是以自己的诗学观点点评诗歌。而这个“竟陵”诗风的追随者沈春泽就被钱氏列在《列朝诗集》丁集上的最后一位。

第二，《小传·王僉事思任》：

季重为诗，才情烂熳，无复持择，入鬼入魔，恶道岔出……季重颇负时名，自建旗鼓，钟、谭之外又一旁派也。余痛加芟薙，仍标举如此⁴。

王氏虽“颇负时名”，却被钱氏认为是“入鬼入魔”，这与钱氏形容“竟陵”诗风的用词如出一辙。更认为

1 钱氏回护“公安三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钱氏认为不是“三袁”本人之诗作的问题，而是“效颦”者，即“三袁”之后学者的问题，如其在《小传·袁稽勋宏道》一文中引用了袁中道的评语：“学而不察，效颦学语，其究为俚俗，为纠巧，为莽荡，乌焉三写，弊有必至，非中郎（按：袁宏道）之本旨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568页。为何对于“竟陵钟、谭”之问题上不做同样方向的考虑，或许是钱氏与“三袁”私交甚好，清楚地了解其诗作之实质。但是另有一说，钟惺与钱氏亦相交甚好，只因“韩敬”一事而生隙，存此待进一步探究。

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567页。

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473页。

4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475页。

王氏是“钟、谭之外又一旁派也”，就被列在《列朝诗集》丁集中垫尾的位置。

第三，《小传·商秀才家梅》：商氏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他是与钟惺“交好”的，这与前文中的“吴门朱隗”和“沈秀才春泽”有些相似，但其“少为诗，饶有才调”，在“从伯敬游”之后，却“一变为幽闲萧寂，不多读书，亦不事汲古”。后来在钱氏的引导之下，沈氏“俯而深思，喟然而长叹曰”：

善哉，子之教我也！我今而知所以自处矣。我宁规规封己为僻固狭隘之唐人，不愿为不僻固不狭隘之今人也。子幸以斯言叙我诗，百世而下有指而目之者曰：此有明之世一僻固狭隘之诗人也。¹

一句“子之教我也”，钱氏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诗学导师的形象，一手促成了一个人的诗学之路的转向，并且希望“以谄于世之知诗者”。当然，由于这一“改旗易帜”的举动，商氏并不像以上两者，受到排列末尾的待遇，更没有像之后三者，落得个诗作被任意“祓除”的下场。

第四，《小传·王山人野》：

（王野）晚年诗颇为竟陵熏染，竟陵极称之，为评鹭以行世。凡竟陵所极赏者，皆余之所汰也。²

钱氏并非排击“竟陵”一脉的所有的理论，如上文所述有关主“灵”说。但在这里却说“凡竟陵所极赏者，皆余之所汰也”，将自己的诗学理论和诗学观念凌驾于其他诗学风气之上，这由自己掌握话语权的心态，呼之欲出。

第五，《小传·吴居士鼎芳》：

凝父（按：吴鼎芳）与葛震甫（按：葛一龙）称诗于两洞庭，皆能祓除俗调，自竖眉目。震甫晚自信不笃，颇折入钟、谭；而凝父亭亭落落，迥然尘埃之外。震甫自负才大，以为入佛入魔，无所不可，竟不免堕修罗藕丝中；凝父修声闻辟支果，虽复根器小劣，后五百年终不落野狐外道也。³

《小传·葛理问一龙》：

（葛一龙）已而年渐长，笔渐放，楚人谭友夏之流，想与尊奉之，浸淫征逐，时时降为楚调，人谓震甫之咻于楚，犹昌谷之移于秦，可为一喟也。余录震甫诗，立为爬剔，祓除其晚年之变调，而震甫之本来面目宛然故在，不独为震甫解嘲，亦使吴之后贤知所以自树云耳。⁴

1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589页。

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606页。

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609页。

4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610、611页。

前后两篇传文，涉及两位“称诗于两洞庭”的人物，“吴居士鼎芳”与“葛理问一龙”。由于两者诗学观念的差异，前者被称颂为“亭亭落落，迥然尘埃之外”，后者却被认为是“自负才大，以为入佛入魔，无所不可，竟不免堕修罗藕丝中”，其诗更被钱氏“立为爬剔，袪除其晚年之变调”，受到和“王山人野”同样的对待。钱氏更言其此做法之意义在于，还“震甫之本来面目”，和“亦使吴之后贤知所以自树”。

第六，《小传·王秀才留》：王氏首先是以“狎主齐盟”的形象出现的，接着，钱氏笔调一转：

亦房（按：王留）之生也晚，未能传习其家学，而又浸淫于时调，纵横跌宕，于先人之炬燹，遂将偈而去之。其诗有曰：……则不独谓之诗魔，而转入恶道中矣。余录其声调之俊逸者，才得数首，使知者以为伯谷之收子；而无使不知者以为近时之渠帅也。”¹

这当然也是借批判王氏进而攻击“竟陵”诗风，和上文中对“葛理问一龙”、“王山人野”的叙述手法和目的是基本一致的。

以上就是《列朝诗集小传》中与“竟陵”诗风有关的诗人，其中的“沈秀才春泽”和“王金事思任”，或是与钟惺交好，或是与“竟陵”诗风相类似的“又一旁派”，因着这层关系均被打入了所在集子的最末一位；“葛理问一龙”、“王山人野”以及“王秀才留”也受“竟陵”熏染，较前两者，尽管与钟、谭关系要疏远一些，也落得个诗作被任意“袪除”之下场；只有“商秀才家梅”，由于有了“改旗易帜”的举动，并不像前两者，受到排列末尾的待遇，更没有像之后三者，被任意“袪除”诗作。

如果拿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作为对比，还可以发现其他一些问题。如《静志居诗话·王思任》一文中仅言其“滑稽太甚，有伤大雅，”²虽然在附录中引用了钱氏评价王氏“钟、谭之外，又一傍派也”，然而这不能算是朱氏自己的看法。而在《葛一龙》一文中³，朱氏丝毫没有提及葛氏入“楚调”一事。

另外，邬国平先生认为，钱氏在《沈秀才春泽》一文中引用沈氏的话有两处严重的错误：“一、沈春泽写此序时，钟惺尚在人世，‘伯敬亡，雨若著论曰’云云，纯系子虚乌有。二、‘波流风靡’以下引文，在原序里作‘波流风靡，此倡彼和，有识者微反唇于开先创始者，则何不取《隐秀轩集》而读之也’。……钱谦益将被沈春泽批评的‘有识者’的看法当作沈春泽自己的意见，与原文的意思适相反。钱氏根据误解和弯曲的引文，得出沈春泽在钟惺死后‘遂反唇于伯敬’的结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⁴

从这些例子均可以推测，钱氏的《列朝诗集》在品评诗作和评价诗人时，特别注意其与“竟陵”诗风的关系，并以此作为选择诗作和臧否人物的重要标准，甚至是诗集的卷次排列，都与此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⁵。

1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658页。

2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第4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

3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第590页。

4 邬国平：《竟陵派与明代文学批评》，第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但是邬氏此言并未表明所据何处，存此作一家之言。

5 有人认为，“四子（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才是钱氏于《小传》中批判的重点。参见周建谕：《〈列朝诗集小传〉的明诗批评及其用意》，《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但应当看到的是，钱氏对“四子”及其追随者之批判，仅用“木偶”、“模拟剽贼”一类的词，而对“竟陵”诗风的批判却从文学范畴跨出，上升到“诗妖”的道德高度，批判力度更甚、更劣；且于《列朝诗集》的选诗、品诗，以及卷次排列，都与“竟陵”有莫大的关系。而这“诗妖”一语这更是触及中国人心中一个非常敏感的思想，而且历史发展似乎也“验证”了钱氏的说法，于是，后学之人多半沿袭此说，虽然他们和钱氏一样，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和清晰的分析来说明竟陵诗风和亡国的关系。

《列朝诗集》，分为乾集、甲前集、甲集、乙集、丙集、丁集以及闰集七个部分。乾集分为上、下，辑录明朝十帝、十八王之诗，甲前集辑录朱元璋起兵至建立明朝之前的诗作，多为元末遗民的作品，甲集辑录洪武和建文两朝的诗作，乙集辑录永乐至天顺六朝的诗作，丙集辑录成化至正德三朝的诗作，丁集分为上、中、下，辑录嘉靖到崇祯六朝的诗作，闰集辑录僧道、异人、香奁、宗室、内侍等人的诗作。“竟陵”诗风的盛行是明末三十多年之事，因而这里只谈丁集。

冠列丁集上的是“高按察叔嗣”，钱氏在传文中说明了这一原因：“蔡白石、王岩潭以苏门为我朝第一。其言虽过，要之未可尽非也。余故录子业（按：高叔嗣）诗，取冠丁集云。”¹但“高按察叔嗣”诗名显赫之年代是在“竟陵”诗风兴起之前的，可暂不予考虑。处丁集上末尾的，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沈秀才春泽”，他对钟惺是“深所慕好”的，且“郑重请其诗集，序而刻之”，这样也就成为了钱氏笔下“才情故自烂然，率易丛杂，成章者绝少”之人。

在丁集中部分，领衔者为“陆少卿师道”，其为文征明的弟子，又是“吴门”，钱氏便多有赞誉：“风流儒雅，彬彬可观”²。此集最末一位的就是与“竟陵”诗风相类似的“又一旁派”——“王金事思任”，在其之前的是“竟陵”诗风的创始之人之一——钟惺，谭元春仅附见于钟惺传文之后。

丁集下，列为首位的就是“松圆师老程嘉燧”，也就是程孟阳，钱氏与其交往密切，这里不用再赘述。而这最后一集最后一位的“傅秀才汝舟”，钱氏认为其是“为诗皆牛鬼蛇神，旁见侧出”，虽然钱氏在传文中称赞了傅氏“忠义抑塞如此”³，但这“忠义”却并非钱氏选诗的标准（不然为何傅氏的诗作被列在最末）。这当然也就对陈寅恪先生赞同道隐所认为的“牧斋编列朝诗集，其主旨在修史，并暗喻复明之意，而论诗乃属于次要者”提出了质疑⁴，就如严迪昌先生所言：“当时及后世关于《列朝诗集》何以不选遗烈人士诗之讨论，大抵执着于‘史’而轻忽此‘史’乃牧斋以其诗学观所构架之明诗之史，非专意以诗存明史。”⁵

由此，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无论对于钟、谭本人，还是其追随者的诗作，钱氏均以“鬼”、“魔”、“僻”之类的词概括；而《列朝诗集》的选评诗作及臧否人物、卷次排列，都与“竟陵”有着莫大的关系。以此，刻意淡化“竟陵”诗风在明末诗坛已经发生或者继续发生的影响，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苦心纠谬天下诗风，引导诗坛习气的领导者形象，雄踞坛坫，垂范后世。

三 钱谦益其他诗文集对“竟陵钟、谭”的排击

为了更加确定笔者对于钱氏批判“竟陵钟、谭”旨意的推论，从钱氏的诗文集中，另细拣出了一些与“竟陵”诗风有关的例子。首先是《初学集》中与此主题最密切相关的《序》，按时间先后兹列如下⁶：

1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372页。

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474页。

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664页。

4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9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5 严迪昌：《蒙叟心志与《列朝诗集》之编纂旨意》，《语文知识》，2007年第4期。

6 《初学集》卷三十二《曾房仲诗序》、卷三十三《南游草序》、卷四十《孙子长诗引》以及卷四十《冯己苍诗序》中均有关于“竟陵”一脉的文字，这里不一一罗列。

(一)《初学集》卷三十一《刘司空诗集序》(崇祯十一年, 1638年):

万历之季,称诗者以凄清幽眇为能,与古人之铺陈终始,排比声律者,皆訾訾抹杀,以为陈言腐词。海内靡然从之,迄今三十余年。甚矣诗学之舛也!……又使世之览山水造居室者,舍名山大川不游,而必于诡特,则必将梯神山,航海市,终之于鬼国而已;舍高堂邃宇弗居,而必于突奥,则必将巢木杪、营窟室,终之于鼠穴而已。¹

文章最后,钱氏在文字中第一次出现“诗妖”一词,并与“竟陵”诗风相联系,²他说:

史称陈、隋之世,新声愁曲,乐往哀来,竟以亡国。而唐天宝乐章,曲终繁声,名为入破,遂有安、史之乱。今天下兵兴盗起,民不堪命,识者以谓兆于近世之歌诗,类五行之诗妖。³

(二)《初学集》卷三十《徐司寇画溪诗集序》(崇祯十五年至十六年, 1642~1643年):

自万历之末以迄于今,文章之弊滋极……取近代之诗而观之,以清深奥僻为致者,如鸣蚓窍,如入鼠穴,凄声寒魄,此鬼趣也。以尖新割剥为能者,如戴假面,如作胡语,噍音促节,此兵象也。鬼气幽,兵气杀,著见于文章,而气运从之。有识者审声歌风,岌岌乎有衰晚之惧焉。……先生(按:徐宝摩)之诗出,而宇内幽阴鬼杀之气,盖已荡为和风,而化为清尘矣。⁴

这是钱氏在文字中第一次用“鬼趣”、“兵象”来形容“竟陵”诗风,并在文段的第一句话中,隐约将文学范畴与政治范畴的相连,在下文中,他加强了这种联系:

昔者有唐之世,天宝有戎羯,而少陵之诗出;元和有淮蔡之乱,而昌黎之诗出。说者谓宣孝、章武中兴之盛,杜、韩之诗,实为鼓吹。今东夷南寇,王师在野,游魂丑类,将取次扫除,而先生(按:徐宝摩)之诗,应运而出。天子大开明堂,采诗定乐,将以先生之诗为风始,岂偶然哉?⁵

钱氏成功将文学范畴与政治范畴相连,将国家的兴衰与诗作相连,想表达的意思是却反而是:正是“天

1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第908页。

2 《列朝诗集》的编纂有两次,据其《序》称,第一次编纂乃“天启(1620~1627年)初年事”,仅纂“几三十家”后则“罢去”。第二次着手编纂起于明亡之后,“托始于丙戌(顺治三年,1646年),彻简于己丑(顺治六年)”,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清顺治九年毛氏汲古阁刻本。由毛晋接手开始雕版,到顺治十一年完工。此《序》写成于顺治九年,可以推断,《列朝诗集》的最终编纂至晚于顺治九年,大略地说,钟、谭二人的小传也应作于明亡之后,而《初学集》所收录的为钱氏明朝时的作品,因而,《初学集》中的这篇《刘司空诗集序》定是早于《小传》关于“竟陵”诗风的文字,当然也包括钟、谭的传文。因而可以说,这是钱氏于文字中第一次用“诗妖”来形容“竟陵”诗风。而后文引《徐司寇画溪诗集序》,亦是其于文字中第一次出现“鬼趣”、“兵象”,道理相同。

3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第809页。

4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第903页。

5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第304页。

宝有戎羯”、“元和有淮蔡之乱”，才有“少陵之诗出”、“昌黎之诗出”，而并没有出现后期所特有的诗作预兆国家兴亡的因果联系。

在钱氏《初学集》的一些《书》中也涉及此话题¹，最早且清晰地表达对“竟陵”诗风批判的当属《戏题徐元叹所藏钟伯敬茶讯诗卷》（崇祯四年，1631年）：

钟生品诗如品茶，龙团月片百不爱，但爱幽香余涩留齿牙。

……

懵腾茗芋良足了，清吟韵事非所宜。

还君此卷成一笑，何异屠门大嚼眼饱胸中饥。²

《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崇祯十三年，1640年）是一组为品评当时作家而作的诗，简明扼要，立论明确，比起其他诗作，更清晰可见其诗学宗旨和文学主张，其第十一首中有：

王微杨宛为词客，肯与钟谭作后尘。³

这是借赞扬女性诗人的作品而批判“竟陵”诗风。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刘司空诗集序》、《徐司寇画溪诗集序》两篇外，其余关于“竟陵”的篇章，都仅用“苍蝇之鸣”、“蚯蚓之窍”之类的文字来批判，没有与国运相联系。这诸篇的写作都早于《列朝诗集》各个小传。因而，这是钱氏最早批判“竟陵”诗风所做的尝试，而批判模式和思考方向，最终还是在《列朝诗集》的钟、谭二人的传文中成熟的。

在钱氏入清所作的《有学集》中，也有与“竟陵”诗风相关文字。⁴除《古诗赠新城王贻上》一篇仍然涉及“诗妖”之语，言：“么弦取偏张，苦调搜调噍。鸟空而鼠即，厥咎为诗妖。”⁵其余篇章中对于“竟陵”诗风排击的力度小了很多，而且没有正面点明的批判，同时还很感慨地认为，文翔凤、王象春、钟惺的才力是“伯仲之间耳”，“而身后之名，飞沈迥绝，殆亦有幸有不幸焉。千秋万岁，古人所以深叹于寂寞也”⁶，有哀婉叹息之意。而且还将钟惺与袁中道相提并论，并多有赞语。而这所有的文字，均是在《列朝诗集小传》中钟、谭二人的传文完成之后，也就是在对“竟陵”诗风的批判模式和思考方向完全成熟之后的作品。但此时的排击力度以及角度却有相当大的调整，含义为何，深有可探。

1 《初学集》卷七十九《答唐训导汝谔论文书》、卷八十三《题怀麓堂诗钞》、卷八十三《书李文正公手书东祀录略卷后》、卷一百六《读杜小笺上》中均有关于“竟陵”一脉的文字，这里不一一罗列。

2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第299～300页。

3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第606页。

4 《有学集》卷十七《季沧苇诗序》、卷二十二《赠别胡静夫序》、卷四十八《题冯子永日草》、卷十七《王贻上诗序》、《稼菴近草序》、《有学集文钞补遗·白下秋声引》中均有关于“竟陵”一脉的文字，这里不一一罗列。

5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第544页。

6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第765页。

四 从《列朝诗集序》看编纂旨意与钱谦益对“竟陵钟、谭”的排击

以上是从钱氏的诗文集中细拣出的有关“竟陵”一脉的部分内容，并做了详细的分析，对钱氏排击的脉络和旨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之前的诸多研究都没有关注到《列朝诗集》的序言，认为钱氏是借此混淆视听，以掩盖本来的意图。应该注意的是，这篇涉及《列朝诗集》编纂旨意的文章完全出自钱氏本人之手，严迪昌先生曾在他的有关文章中说“言为心声”¹，也就是说，钱氏在此文中，即使有所掩饰，也会由这心中想出、笔下流出的文字中或多或少地透露出些许编纂此书的真正目的。其文云：

毛子子晋刻《历朝诗集》成，余抚之忼然而叹。毛子问曰：“夫子何叹？”余曰：“有叹乎？余之叹，盖叹孟阳也。”曰：“夫子何叹乎孟阳也？”曰：“录诗何始乎？自孟阳之读《中州集》始也。孟阳之言曰：‘元氏之集诗也，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吾将仿而为之。吾以采诗，子以庀史，不亦可乎？’山居多暇，谩次《国朝诗集》几三十家，未几罢去。此天启初年事也。越二十馀年而丁开宝之难，海宇版荡，载籍放失，濒死讼系，复有事于斯集。托始于丙戌，彻简于己丑。²

此文从程嘉燧开始，交代编纂的初始缘由：仿元好问《中州集》，“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且言“《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程嘉燧“采诗”，钱氏“庀史”，之后“罢去”，最后于明朝灭亡之后才着手编纂完成。接下来写道：

（毛晋）曰：元氏之集，自甲迄癸。今止于丁者，何居？”（钱氏）曰：“癸，归也。于卦为归藏，时为冬令。月在癸曰极。丁，丁壮成实也。岁曰强圉。万物盛于丙，成于丁，茂于戊。于时为朱明，四十强盛之年也。金镜未坠，珠囊重理，鸿朗庄严，富有日新天地之心声，文之运也。³

这是钱氏有关此书编纂旨意最为关键的，也是最为隐晦复杂的一段文字。严迪昌先生认为此处之“丙”、“丁”指的就是《列朝诗集》中的“丙集”、“丁集”，而虽然万物是“盛于丙”，但是还“成于丁”。这冠列丁集的人，前面已经提到，是和钱氏关系非常密切，诗学思想非常相似的程嘉燧。而最后的“茂于戊”呢，书中并无“戊集”。严氏认为：

既然“成于丁，茂于戊”，而《列朝诗集》却止于“丁”，“丁，丁壮成实也”。那末，“茂于戊”则何属？此正乃“今止于丁者何居”之间的潜台词。如前所述，何以“止于丁”、“成于丁”问题得

1 严迪昌：《蒙叟心志与〈列朝诗集〉之编纂旨意》。

2 钱谦益：《列朝诗集》。

3 钱谦益：《列朝诗集》。

解释,“茂于戊”之“非我莫属”之答案也就按之而出。¹

在《钱牧斋先生尺牘·与周安期书》一文中,钱氏曾提及过此书编纂之旨意:“鼎革之后,恐明朝一代之诗,遂致淹没,欲仿元遗山《中州集》之例,选定为一集,使一代诗人精魂,留得纸上,亦晚年一乐事也。”²在《与毛子晋》的书中也言:“须少待时日,与陈卧子诸公死节者并传,已有人先为料理矣。”³可从上文所分析来看,这恐怕仅仅为最表层的意义,是钱氏愿意传达给读者的意义。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钱氏对于“竟陵”一脉的排击,仅用“深幽孤峭”、“鬼趣”一类的词语来形容,没有更细致、更明确、更令人信服的表达;且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断然将对其的批判,套上了“诗妖”的道德枷锁,从文学范畴,扩展到政治范畴、道德范畴,使其在“征兆国家之盛衰”的历史和道德的双重压力之下,难以翻身。究其排击“竟陵”的目的,就是通过刻意淡化“竟陵”诗风在明末诗坛已经发生或者继续发生的影响,借此掌一代诗坛之“坛坫”,收归“馆阁文权”,并用编纂《列朝诗集》的方式,构建以自己诗学观念为主的明清诗坛,垂范后世,青史留名。郑振铎先生早已敏锐地看到:“以国运的沈沦,而归罪于……竟陵诸子,可谓极诬陷的能事!然千古人的耳目,又岂是几个正统派的文人们所能束缚得住的!”⁴

这里还有一些例子能进一步证明此推论。在《小传·谭解元元春》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吴、越、楚、闽,沿袭成风”⁵,“楚”指的是钟、谭的家乡湖北地区,而“吴”包括钱氏的家乡江苏地区。由楚地而起的“竟陵”诗风竟然影响到钱氏的家乡。且在《初学集·孙子长诗引》中更有“迩来吴声不竞,南辱于楚”⁶之的话。也就是说,在钱氏的鼻息之下的吴地,却是由楚地之声主导诗风,作为至少是地方文坛领袖的钱氏来说,不能掌握本地的风尚流变,这受“辱”之意味,呼之欲出,这当然也是促使他排击“竟陵”诗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

五 余 论

明清之际诗坛的一大特征,即是不同诗歌流派的相继出现,系统诗学理论、诗学方法初出端倪。钱谦益于竟陵的代兴,是明末清初诗坛的重大的事件,意义甚大。除了诗学理论的转变,诗学风气的改变,它更标志着“馆阁文权”的“回归”,标志着诗风由楚地“回归”至吴地,而这两者的“回归”,都是钱氏所最希冀的,也是他奋起排击“竟陵钟、谭”一个最为隐秘的目的。

钱氏力起而排击“竟陵”一脉,对其所作几乎是“一锤定音”的、“极其负面”的评价⁷,最终达到目的:

1 严迪昌:《蒙叟心志与〈列朝诗集〉之编纂旨意》。

2 钱谦益:《牧斋杂著》,第236页。

3 钱谦益:《牧斋杂著》,第315页。

4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9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5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573页。

6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第1086页。

7 严志雄:《钱谦益攻排竟陵钟、谭侧议》。

在这严苛的贬斥中,钱氏掌握了一代诗坛“坛坫”,收归了“馆阁”文权,黄宗羲言其“四海宗盟五十年”¹,此言不虚,《清史稿》中赞其:“谦益归命,以诗文雄于时,足负起衰之责”²;同时,钱氏也实现了其所希冀的对于“竟陵”诗风的批判,明清以降,对竟陵的批判不出两大范畴,一是“对钟惺、谭元春及其诗学做知识性与考订性的论定”,二是“将钟、谭及其诗作置诸泛历史及道德论的三棱镜下”³。朱彝尊《静至居诗话·钟惺》一文中言:“《诗归》出……取名一时,流毒天下,诗亡而国亦随之亡矣。”⁴同书《谭元春》一文中也说:“《诗归》既出……此先文格斥为亡国之音也。”⁵

另外,钱氏对“竟陵”诗风批判的影响颇深,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不仅有着钱氏作为诗坛甚至是文坛盟主的话语权威,也在于“竟陵”诗风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病(但这弊病是来自钟、谭诗作和诗学理论本身,还是来自后学之人的“效颦”之举,或者二者皆有,还须进一步探讨),更有着“诗妖”一词所涉及的“中国人思想、信仰系统里某些相当深层、敏感的元素”以及明朝随之灭亡的事实。至于后来的人,说后来的话,他们和钱氏一样,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和清晰的分析来说明“竟陵”诗风和亡国的关系,却只看到“竟陵”诗风的盛行和明朝灭亡这两个看似相关却实则完全无关的事件。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赵中男)

1 黄宗羲:《黄梨洲诗集》,第49页,中华书局,1959年。
 2 赵尔巽:《清史稿》,第13324页,中华书局,1977年。
 3 严志雄:《钱谦益攻排竟陵钟、谭侧议》。
 4 朱彝尊:《静至居诗话》,第203页。
 5 朱彝尊:《静至居诗话》,第563页。